

时代的呼唤

时代的呼唤

时代的呼唤

时代的呼唤

时代的呼唤

隆德 黄传新 著

时代的呼唤

——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金隆德 黄传新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超
丁怀超

封面设计：谢丽君

时代的呼唤

——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金隆德 黄传新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210,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

ISBN7-212-00124-4/A·1 定价：2.80元

前 言

公元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使中国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中国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即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时代，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大发展、大前进的时代。

中国在巨变，世界也在巨变。新技术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改革调整潮流在世界范围兴起，世界各国已经进入了争取21世纪有利的战略地位而增强“综合国力”的竞争的时代。

伟大的时代，热烈地呼唤着伟大的理论。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全世界人民正在进行新技术革命和改革调整的伟大实践，如此丰富生动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运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和创造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纪念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之际，我们较为系统地重温一下这些理论成果，对于进一步认清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改革的深化，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写出了《时代的呼唤——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一书。

谨以此书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

目 录

前 言	(1)
-----------	-------

哲 学 编

第一章 真理标准讨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3)
一 真理标准讨论是解放思想的斗争	(3)
二 真理标准讨论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10)
三 从真理标准讨论到生产力标准确立	(16)
第二章 实事求是思想的新发展	(23)
一 明确了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23)
二 指出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概括	(26)
三 确定了实事求是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	(29)
四 阐明了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一致性	(32)
第三章 矛盾学说的运用和发展	(35)
一 正确地理解对立统一规律，肃清“斗争哲学”的影响	(35)
二 科学地分析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	(39)
三 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	(43)
四 运用两类矛盾学说，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中的两类矛盾	(47)
第四章 唯物史观的重新确立	(51)
一 破除离开生产力抽象谈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	(51)
二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58)

经 济 学 编

第五章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学说的新发展 (69)

一 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 (69)

二 确认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
阶段 (76)

三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的新突破 (82)

第六章 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新突破 (85)

一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形状方面,确定了多种经济形式长期
并存、共同发展的新观念 (85)

二 在全民所有制内部结构方面,确立了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
分开的新观念 (93)

三 联合所有制的出现与发展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存在
形态的深刻变革 (99)

第七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01)

一 实行计划经济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101)

二 确认计划同市场可以统一的新观念 (105)

三 建立以间接管理为主的计划体制 (107)

第八章 对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新贡献 (115)

一 充分肯定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 (115)

二 正确解释了按劳分配与一部分人先富的辩证关系 (119)

三 明确提出以劳动成果作为个人消费品分配依据的新论点 (121)

四 确立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
方针 (124)

第九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新探索 (128)

一 以中国国情作为经济建设的基本出发点 (128)

二 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模式 (132)

三 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位 (135)

四 坚持生产建设与生活消费一起抓 (139)

五 走中国式的科技发展道路	141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对外经济关系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146—(166)
一 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146)
二 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伟大创造	(154)
三 作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重大决策	(158)

科学社会主义编

第十一章 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169)
一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169)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论述	(172)
三 三中全会以来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177)
第十二章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191)
一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和实践	(191)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和历史地位	(196)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意义	(204)
第十三章 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	(208)
一 建国以来党制定总路线、基本路线的经验教训	(208)
二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及其内容	(212)
三 党的基本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216)
第十四章 “一国两制”的新构想	(220)
一 “一国两制”的提出和它的科学含义	(220)
二 “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根据	(223)
三 “一国两制”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结构的新模式	(230)
第十五章 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	(234)
一 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的结晶	(234)
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逻辑联系	(239)
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点	(242)
后 记	(245)

哲学编

第一章 真理标准讨论恢复了马克思 主义思想路线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伴随着这次伟大转折的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端的。因此，我们在重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时，首先应该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讲起。

一 真理标准讨论是解放思想的斗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然而，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由于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继续推行“左”的错误路线，维护个人崇拜，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难以深入。“文革”期间造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得不到纠正，人民群众强烈地要求恢复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工作受到拖延和阻挠，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合理要求受到限制，而这一切都是以思想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依据的。

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

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一段时间内，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就是用“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禁锢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10月26日，他提出：“目前主要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1977年2月初，他又让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方针写在他准备讲话的提纲中。1977年2月7日，在沿用“文革”期间惯用的“最权威”的方式即两报一刊社论所发的《学好文件抓纲》中，按照这位主要领导人的意见，经过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的批准，代表当时的党中央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同年3月14日，在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当时党中央的那位主要领导人在讲话中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推行“文革”中的错误理论、方针和口号，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正确的，继续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等等。这一方针，同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一提出，就遭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出来工作，但他找起草那篇社论的两位作者谈话，指出“两个凡是”的提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如果主席还健在的话，对这种提法也会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果这个提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就不能出来工作了。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领导同志都反对“两个凡是”的方针。当时参与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在1977年冬一千多高中级干部研究十年经验教训时，就针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明确地提出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指示，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与此同时，不少读者写信给《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各种异议。1978年初，《人民日报》也准备针对“两个凡是”的提法展开讨论，

并在3月26日该报第三版上刊登了报社理论部的同志写的署名张成的一篇短文《标准只有一个》，虽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也有反响。1978年初，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了一篇真理标准的稿子，投给了《光明日报》哲学副刊。

《光明日报》的同志感到这篇稿子提出的论点很重要，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发表它可能要担风险。这时，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总编，看过这篇文章后表示完全赞同，打算组织力量加工后发表。不久，胡耀邦也知道了这篇文章。他看过后，要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室的同志和《光明日报》同志一起帮助作者修改，并亲自审阅定稿，于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还有针对性地指出：革命导师“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通讯社把它转发到全国。但是，当时党中央的那位主要领导人企图加以压制，指示《红旗》杂志不要表态，批评一些支持真理标准是实践的同志。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在许多场合指名谴责这篇文章，说什么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批评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社负责人没有党性，甚至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还针对当时全党要求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潮流，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一些受其影响的同志，也认为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此后，全国绝大多数报刊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文。为了回答反对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的种种责难，在当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的关怀下，同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系统地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根本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不能不从这里开始。”提出“要恢复《实践论》的权威，实事求是的权威，实践标准的权威，以使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重新发扬光大。”这时，全国理论界非常活跃，积极参加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争论中，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支持和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发表了大批文章，召开了不少讨论会。从1978年6月到11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了讲话或文章，有力地推进了这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邓小平起了先导和关键的作用。1977年4月，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针对当时割裂和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倾向，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4月和5月，他多次讲“‘两个凡是’不行”。这一年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中，再次讲到“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且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①这里实际上举起了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旗。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讲到1971年的《全国工作会议纪要》时，明确地指出：“《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

^①《邓小平文选》，第35页。

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① 这些讲话，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是起了很大的启迪作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遭到有的同志谴责后，针对这种谴责，邓小平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深刻的回答。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② 他呼吁：“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③ 这种旗帜鲜明的支持，给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同志们很大鼓舞。在这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多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意义，强调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①《邓小平文选》，第63—6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09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114页。

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常识性的原理，为什么这时候重新提到它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出现如此激烈的争论，而它的争论又揭开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呢？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深藏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以来的历史中，深藏在我国当代社会政治矛盾演变的进程中。本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发展阶段。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已被消灭，阶级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已经历史地终结了。但是，在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下，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论，加以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和领导阶级斗争，形成了从阶级观点看待一切社会矛盾的思维方式，到了新的历史阶段，仍旧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实际上，即使在阶级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也只适用于说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把不是阶级矛盾的社会政治矛盾和其他矛盾，看做是阶级矛盾，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矛盾，看做是全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和指导思想上的迷误，导致了实际工作的长期失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②在“左”倾错误发展的同时，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也盛行起来，到“文革”中达到宗教狂热的地步。极左思潮、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三位一体，在这段时期内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必然会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结束“左”倾错误路线，尽快地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

^①《邓小平文选》，第133页。

^②《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33页。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要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首先就必须冲破极左思潮、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因此，以真理标准争论为发端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发生，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它为三中全会后全面拨乱反正、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它也为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理论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冲破长期以来把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神圣教条的精神禁锢，用科学观点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突破与实践相悖的旧观念、旧理论，创立与实践相符的新观念、新理论开了先河。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形成了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二 真理标准讨论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今天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然而，这个基本原理的提出，却是长期以来人类认识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探索和斗争的结果。例如，在欧洲，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到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到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哲学路线不同，真理观不同，其真理标准也不同。概括地说，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以所谓上帝的意志为最高真理，以“圣经”教条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在反对宗教神学中提出了“理性审判”，崇尚理性和经验，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的强调理性，有的强调经验。唯心主义者主张从思想、观念、理论、理性中寻找真理的标准，始终没有超出思想等主观的范围，当然不可能解决真理标准问题。机械唯物论者在突破唯心主义的真理观方面做了可贵的努力，然而，他们不懂得辩证法，不了解社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没有认识到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认识过程中由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这两个飞跃的联系，因而也没有能科学地解决真理标准问题。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机械唯物论和唯心主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本身。”^①由此可见，能够作为真理标准的，既不是主观思想，也不是客观事物本身，只能是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的“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论的根本缺陷，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强调实践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574页。